

从贞操枷锁到身体自主：论父权社会性别规训下的女性极端表达反抗实践

王诗乐

韩国中央大学, 韩国 首尔 06974

DOI:10.61369/HASS.2025040001

摘要： 本研究通过一位女性自述“想要从事性工作”的极端表达作为观察窗口展开分析，主要运用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探讨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在性别规训与社会结构性压迫下如何通过身体行为表达主体性诉求。该女性虽经济条件富裕，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因为早年家庭创伤及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深刻洞察，试图以“成为被污名化的女性群体的一员”来挑战父权社会对“贞洁”的规训。研究还发现，与该女性建立亲密关系的男性在叙述中表现出明显的控制倾向，这说明即使在恋爱关系中，女性仍然面临身体自主权受限的问题，仍然常受到父权逻辑的规训。本文认为，女性对身体的重新诠释以及对主动接受污名标签的行为，是对父权体系的一种隐形颠覆，这种抵抗值得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内得到重视。毕竟反抗行为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政治运动方式，例如组织游行、签署联名信这些形式。女性以身体为场域展开的边缘表达同样具有颠覆性与理论价值。通过这一个案，本文试图揭示个体极端行为背后反应的深层次社会结构矛盾，如性别歧视、刻板印象等问题。为女性反抗实践的多样性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并呼吁对女性“非主流选择”背后的主体性考量，予以更多理解与尊重。

关键词： 性别规训；身体自主；污名认领；父权社会；极端表达；性工作者；女性主义

From Chastity Shackles to Physical Autonomy: on Women's Extreme Expression and Resistance Practice under the Patriarchal Gender Discipline

Wang Shiyue

Central University of Korea, Seoul, Korea 06974

Abstract : this study analyzes a woman's extreme expression of "wanting to engage in sexual work" as a window of observation, and mainly uses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to explore how women express their subjective demands through physical behavior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under gender discipline and social structural oppression. Although the woman has rich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she tried to challenge the patriarchal society's discipline of "chastity" by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stigmatized female group" because of her early family trauma and her profound insight into gender inequality.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man who establish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man showed a clear tendency of control in the narration, which showed that even in the love relationship, women still faced the problem of limited physical autonomy and were often disciplined by the patriarchal logic.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omen'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ir active acceptance of stigma labels are an invisible subversion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is resistance deserves atten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After all, resistanc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raditional political movements, such as organizing demonstrations and signing joint letters. The marginal expression of women's body as a field also has subversive and theoretical value. Through this cas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deep-seated soci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hind individual extreme behavior, such as gender discrimination, stereotypes and other issues. It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diversity of women's resistance practice, and calls for mor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subjectivity behind women's "non mainstream choice".

Keywords : gender discipline; physical autonomy; stigma claim; patriarchal society; extreme expression; sex workers; feminism

引言

“我想做一名性工作者”。这句话来自一位中国年轻女性的社交平台投稿，迅速的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道德层面的争议。比较有意思的是，和大众印象里“穷困潦倒”或者“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不同，这个投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条件很好，却选择用这种被社会贴负面标签的身份来表达对性别规训的不满与反抗。这一极端表达，不仅仅是在打破了人们对“正经女孩”与“坏女人”刻板划分，其实更是在问我们：在男女权力关系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到底能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身体？如果常规的表达途径被堵塞的时候，极端化的表达是否可能成为她们争取自主权得方式？正如 Ahmed 所言，女性主义的实践往往源于对日常压迫的‘不服从’——通过愤怒、越轨与夸张的身体表达，女性在看似‘非理性’的行为中开辟反抗空间^[1]。这种解释其实可以看作是对“自愿选择特殊职业”现象的一种理解角度：极端表达未必是失控，更像是针对结构性压迫的策略性应对。

本研究聚焦于父权制度与社会性别规范共同作用的场域，探讨女性群体如何通过主动接受污名化的行为策略进行特定形式的激烈表达，从而释放那些被传统社会结构所压抑的自我意识与身体控制权。文章主要基于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同时结合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以及波伏娃对“第二性”的经典论述，试图说明当代女性是怎样通过策略性地接受某些负面社会标签，来对抗那些已经内化到思维深处的性别限制。通过对上述个案的文本分析，本文认为这种污名化认领行为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自我毁灭，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某种带有矛盾意味的自我建构方式，本质上是在既有的社会规范框架之外，尝试开拓具有自我决策可能性的特殊行动空间。

（一）研究背景

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家庭权力体系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碰撞持续引发性别相关议题。虽然从法律层面看男女平等原则正在推进落实，但一些深层的文化习惯，例如关于“贞操观”的固有观念、强调家庭优先的价值取向等，仍然通过潜移默化的约束方式影响着女性的自主选择。比如说“重男轻女”，又比如说社会舆论对女性“失节”的污名化，这种传统思维模式通过道德层面的职责，将女性禁锢于“好女孩”的规范框架之中。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部分女性主动选择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角色，像是从事某些被污名化的职业，可以视为通过极端化的自我表达来突破既有的性别框架。这种行为既反映了社会深层矛盾的激化，也体现出个人在传统规范与现实诉求之间面临的复杂处境。

（二）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与案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在父权制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并存的语境下，女性通过极端身体实践（如自愿成为性工作者）表达反抗的动机和逻辑是什么？

此类“污名认领”行为如何成为对性别规训的战术性回应？其颠覆性与局限性何在？

个体极端表达能否撬动结构性压迫？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如何被重新评估？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从社会学角度看女性问题，身体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不仅具有生物学属性，更多时候承担着社会规训赋予的某种特定含义^[2]。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实际上成为了某种被社会规则所塑造的对象。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既包括制度性的安排（如贞操观念、性别角色期待），更深入渗透在日常生活、情感关系与道德评价标准中，逐步形成对所谓“好女人”形象的标准化定义。这种规范话语使得女性常常需要在“清白”与“堕落”“贤妻”与“荡妇”这些标签之间反复自我审视，并将社会对她们的欲望、羞辱与期待都内化为评判自己的标准。父权制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中的权力结构，通过制定规则、传播特定观念以及在日常行为中不断强化，对女性身心实施系统性规训^[3-6]。简单来说就是，整个社会体系都在用各种方法塑造符合其期待的女性形象。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可以作为分析框架，其指出，权力并非仅通过暴力压制实现，而是经由知识生产、设立道德标准，以及规范身体行为这些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就

像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既包括明文纪律也包含同学间的相互监督。在父权语境下，女性的“贞操”这件事被塑造成衡量女性道德的重要标尺。这种标准实际上成为了规训权力的具体表现形态，社会舆论的监督、家庭伦理的要求，甚至法律条文的规定，都在合力把女性身体改造成“可被驯服的对象”，也就是容易管理和约束的存在。这种“身体政治”不仅剥夺女性的自主权，还通过“好女孩”与“坏女人”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方式，实施着看不见的道德压迫^[4]。Gill的研究表明，媒体通过强化‘良家女性’与‘堕落女性’的对立观念，让女性不自觉地将贞操观念当作自我约束的工具。这与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形成呼应，揭示父权制度通过各种说法来施加看不见的压力^[7]。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进一步揭示了父权制通过“他者化”过程剥夺女性的主体性。她指出，女性被社会定义为“非本质的存在”，其价值依附于男性设定的标准，如贞洁、母性、顺从。这种他者化不仅固化性别分工，更麻烦的是让女性自己都相信这些规矩是对的，将规训转化为自我审查，从而主动照做。现在中国虽然到处在讲男女平等，但传统观念依旧隐藏在很多地方，例如电视剧中贤妻良母

的故事，或者家里长辈念叨女孩子要守规矩，其实都是在用看不见的方式管束着女性的身体行为^[8]。Gill指出，后女性主义媒体文化通过强调个体选择和自我提升，实际上强化了对女性身体的审美规范。这种文化氛围使女性在追求身体自主时，仍受到隐性的社会规训^[9]。

针对父权规训，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了多种分析视角。巴特勒的提出的观点就认为，性别特征其实和天生特质没什么关系，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模式不断重复形成的。这一视角为理解“污名认领”提供了理论支点：比如像有些女性主动使用“性工作”这种带有负面评价的称呼，本质上就是在故意放大社会强加的“不道德”标签，用夸张的行为把那些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变得滑稽可笑。这种做法不仅是个人身份的重构，更可以看作对社会规范边界进行试探的实验手段。此外，边缘群体如何掌控自己的身体的研究也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从“贞操枷锁”到“污名化实践”，女性在身体自主权方面的抗争常常面临两难处境。例如，性工作者的“自主选择”可能在打破传统道德束缚的同时，又让社会对他们的负面印象进一步加深，这个矛盾现象很有意思。并且巴特勒强调，性别并非一个“自然”的内在属性，而是社会期待下被不断重复“表演”的结果。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如果不表演“纯洁”“顺从”与“贤良”，便容易被赋予“荡妇”“不检点”的负面标签。但正如巴特勒所指出的，污名并非只能压迫，它也可以被“反向使用”——即个体可以通过“夸张地扮演污名”，来揭示社会规则的认为建构本质。具体到我们的研究对象，部分女性主动采用“性工作”的称谓，本质上可以理解对既定社会规则的反向操作，可以看作对主流价值体系的有意识对抗^[10-12]。

在现有的研究框架中，关于性工作的探讨往往容易陷入道德评判的固定模式。主流叙事通常将从业者简单归类为“受害者”或者“行为异常者”，这种标签化处理实际上忽视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价值。比如说当我们把性工作完全等同于道德堕落时，这种认知本身可能会成为社会规范对女性进行约束的手段。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条件差异、家庭暴力这些结构性压迫因素，确实会促使部分群体被动进入这个行业，从而形成某种固化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双重属性，也就是既存在道德层面的污名化，又涉及社会资源分配的现实问题，导致相关研究难以突破非此即彼的讨论框架。具体来说，现有文献中对那些主动选择从事性工作的案例，特别是具有社会经济优势的女性群体，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视角。大多数研究更关注行业存在的剥削性问题，但较少讨论到某些女性可能通过自主选择职业身份，来实现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反向挑战。这种研究空白使得我们在理解极端身体实践时，容易停留在表象层面的解读。本文试图从反抗理论的角度切入，重点分析自愿性工作这个特殊类型。简单来说就是探讨从业者如何通过主动接纳被污名化的社会身份，在现有权力结构中寻找突破的可能性，这种研究路径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分析维度。

本研究以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为基础，分析传统家庭结构对女性形成的道德约束压力；结合波伏娃的“他者化”概念，解释

女性自我表达受限的运作机制；借助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探讨边缘群体通过主动接纳特定标签进行策略性对抗的实践逻辑。通过这种多理论视角的交叉分析，我们构建起一个具有双重功能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既能够解释极端表达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压力来源，又特别关注到这些行为本身所包含的主动抗争价值。这样的整合方式不仅深化了对女性抗争策略的理解层次，也为研究特殊职业群体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性工作难以脱离剥削性。本研究虽强调个案能动性，但需承认其可能强化身体的商品化认知^[13]。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方法论层面采用叙事分析框架，将个人陈述视作具有社会互动性质的言语行为。重点观察她们在讲述过程中如何构建自我认知框架（比如说“我是怎样的人”“我为何要这样表达”），以及如何预设听众可能产生的道德评判。特别关注叙述中出现的“发现现象—深入反思—采取行动”这种递进式叙述模式，分析个体是怎样把个人生活经历转化为具有公共讨论价值的社会议题的。

由于本文来自公开社交平台，且内容具高度敏感性，本文在分析中对个体身份进行匿名化处理，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同时，本研究承认研究者的女性主义立场在文本选择与诠释过程中具有建构性，因此研究者自觉采取“情境定位”的方法论态度，以反思性地处理权力、立场与解释之间的张力。

三、案例分析

（一）案例引出

本文的核心案例源于一位年轻女性的极端选择：这位女性虽然成长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但长期存在父母情感关怀缺失的问题，这种成长背景某种程度上让她对社会权力结构和性别规范形成了自己的观察视角。在哲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她开始系统思考社会文化对个体的塑造机制，特别是对传统性别文化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产生研究兴趣。比如说某些欠发达地区要求女性承担供养兄弟的义务，或者社会舆论中存在的婚恋双重标准——她注意到男性交往多个伴侣会被认为“有魅力”，而女性类似行为却要承受道德压力，这种差异化的评判标准引发了她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持续反思。在观察社会行为时，她发现妓女这一被边缘化的群体展现出意外的清醒：她们拒绝迎合男性凝视，甚至以职业身份为工具解构性别权力关系。这一发现颠覆了她对性工作的刻板认知，并促使她萌生了一个极端计划——主动成为性工作者。需要说明的是，该案例中的研究对象并非因经济原因进入这个行业，而是试图通过主动选择被污名化的社会身份，来解构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模式。这种实践思路可以追溯到历史案例——像法国启蒙时期的交际花学者尼农·德·朗克洛，就曾以沙龙女主人身份参与哲学思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身体实践与思想解放可以产生特殊关联。她明显意识到个体的行动其实很难改变那些流传了上千年的文化习惯，但是仍然选择用激烈方式作为

抗争手段，也就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极端表达来引发社会对性别问题的重新审视。不过这种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多方面的矛盾冲突。比如说她的伴侣虽然在思想上支持女性主义立场，但在具体情感层面却产生了剧烈波动：一方面认同她挑战传统规范的行为逻辑，但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某些固有观念的影响——像是潜意识里仍然会把伴侣的身体当作某种专属物。这种矛盾其实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对人际关系的渗透作用，即使自认为思想开明的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自觉地延续旧有思维模式。这个事件不仅是个人反抗的特殊案例，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张力，比如说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理念的碰撞、制度性约束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拉锯等问题。

（二）案例分析

研究对象通过“性工作者”身份的主动认领，将“贞洁”标签转化为反抗工具。她提到“如果‘贞洁’是枷锁，那么‘污名’就是钥匙。”用这种反讽式表达揭示了父权道德标准的双重性，也契合 Outshoorn 对欧洲女性运动中“污名身份策略化”的研究——通过占据边缘角色来破坏主流性别伦理秩序的稳定。她的实践方式表面看是自污，但其实构成了对社会性别认知逻辑的挑战。类似于 Outshoorn 提出的“身体自主即政治对抗”的思路，这种认领方式可视在强规训之下重构主体性的实验性策略^[14]。同时 Weitzer 指出，性工作者的污名抵抗常通过身份重构实现。本案例中研究对象以“妓女”自居，不仅颠覆了职业标签的贬义性，更通过阶级特权放大其反抗的公共可见性。^[15]这里可以参考巴特勒提出的性别身份表演理论，也就是通过刻意放大“堕落女性”的行为特征，让社会性别其实是人为构建的这个本质暴露出来。^[12-14]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童年时期存在情感缺失问题，这个情况和她选择从事性工作之间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就像她原生家庭物质条件优越但缺乏关爱那样，社会上对女性道德的高要求可能反而掩盖了实际存在的压迫现象。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的意义，可以看作是拥有被社会规范束缚的女性共同面临的困境。通过主动给自己贴上污名标签的方式，实际上是在揭露那些隐藏在社会制度里的暴力因素，进而引发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重新思考。在父权文化结构中，性工作者形象长期被视为道德堕落的代名词，其“身体”不仅被视作交易对象，更承载着污名、恐惧与警示意义。因此，当具有主流社会认可度的女性（比如经济独立、受过高等教育）主动选择这种身份时，本质上是在挑战整个性别伦理体系的根基。本文认为这种行为属于策略性的污名认领，其核心目的不是要推广性工作这个职业，而是通过扮演社会定义的“他者”角色，来突显所谓良家妇女身份标签本身的荒谬性。这种“自污”策略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传统贞操观的全盘否定，同时也在消解社会对女性情感忠诚度、情绪表现等方面的刻板要求。通过主动认领“堕落者”的社会身份，主体在语言中打破了被规训的女性形象，将身份重新从“纯洁的象征物”变为抵抗权力的化身。

虽然该言说具有强烈的反叛意图，但其被主流舆论迅速转化为“心理病态”“哗众取宠”或“炒作”，甚至被解读为对道德底线的威胁。这种反映本身也体现出父权社会在面对“非理性女性

表达”时的规训本能——以羞辱、病理化、中性化话语遮蔽其政治性。正如劳伦·贝兰特所言，极端表达往往是边缘个体在无法被社会结构听见时的“情感政治”——它通过失控、崩溃、夸张的方式，使隐藏的结构性压迫变得可见^[16-17]。因此，该女性的言说并非对身体的轻视，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自焚”：用最不可接受的方式去质问社会为何不给她一个体面而自由的生存空间。

虽然研究对象主张对身体具有控制权，但其伴侣表现出的“过度管控倾向”仍显示出传统性别观念在人际关系中的持续影响。例如男方存在这样的矛盾状态：理论上认同两性平等，但实践中无法接受伴侣身体的开放性，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男性潜意识中将对方身体作为专属物的思维定式。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在此适用：即使反抗者试图挣脱宏观规训，微观权力（如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控制）仍可能复现压迫机制。

研究对象的反抗虽具激进型，却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其行为被舆论简化为“特权女性的任性”，导致其社会意义被稀释；其次是实践层面，涉及身体交易的行为污名很难完全消除，反而可能强化社会对女性身体价值的商品化理解。由此可知，个人化的激烈表达虽然能局部改变既有规则，但若缺少系统性变革措施（比如说法律条款的完善、社会观念的渐进调整），其产生的实际影响范围终归有限。

四、讨论

（一）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扩展

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如自由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抗争活动，也就是在立法修改或者组织抗议活动这些方面。这些理论常常把反抗行为等同于“需要经过严密规划的行动”。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身体实践领域其实也存在反抗可能性。Armour 与 St. Ville 强调，情绪化、宗教性与身体化的女性表达不能被排除于政治抗争之外，这些看似非理性的表达常常能揭示深层社会压迫机制^[18]。像某些研究对象故意穿着暴露的服装、在社交媒体发争议性内容这类做法，虽然看起来不够“理性规范”，但实际上能通过引发社会情绪震动来促进结构反思。这要求女性主义理论超越工具理论框架，承认愤怒、挑衅与越轨的解放价值。

这里提出的“污名认领”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主动把被污名化的身份拿来使用，通过重新解释这些符号来实现权力关系的调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污名认领不是被动接受歧视，而是把这些负面标签变成自己的武器。例如，个案以“妓女”身份自居，实际上是为了让公众不得不面对这个称呼背后存在的性别暴力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反过来对歧视者产生压力。这一行为逻辑也可呼应 Edwards 关于“他者性身体”的重新主权化分析^[19]。污名反抗的效果高度依赖阶级与性别位置。本研究，研究对象的经济特权使其“自我污名化”更具挑衅性，但舆论将其简化为“精英游戏”，反而削弱了反抗的公共意义。这种矛盾印证了极端表达的双重性：既是个体能动性的彰显，也可能沦为权力结构的“安全阀”^[20]。

（二）性别秩序与亲密关系中的隐性控制

虽然主流讨论常把女性困境归结于大的社会框架，像是婚姻制度或者传统观念这种宏观因素，但真正产生持续影响的其实更多来自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互动。父权体系中的性别规范往往会通过“爱”的名义、“为你好”的说法，在恋爱关系或家庭生活里形成看不见的约束机制，这种情况下女性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限制，甚至会主动帮对方找理由。本文个案中的女性虽然在经济、教育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却在亲密关系中长期承认如情感控制、性别期待、道德规训等这种以情感之名进行的规训，不同于直接暴力，却在更深层将女性纳入“自我规训”的循环中。如福柯所言，现代权力通过内部化机制，使被规训者主动配合权力结构的再生产。个案中的女性逐渐在反复被否定、道德绑架与自我怀疑中感到“无路可走”，最终选择以极端言说打破这种隐性的困境。所谓亲密关系中的控制行为，很多时候被美化成“在乎对方的表现”，而所谓的爱又被等同于需要单方面妥协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某些个案中出现的激烈反抗行为，本质上揭开了这种被合理化的不平等秩序的真实样貌。

五、结论

在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中，女性的自主选择行为往往不以常规的理性或建设性方式呈现。比如说那些带着强烈情绪色

彩的表达方式，或者看起来不太符合常理的言行，其实可以理解个体在结构性压迫下能够做出的有限选择。我们讨论的这种主动接受负面标签的表达方式，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对性别规范逻辑的特殊对抗策略。这类表达不仅暴露了社会机制中存在的暴力结构，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整个社会对所谓“正常表达方式”的偏好背后，其实存在着对多样化表达形式的压制。简单来说就是，女性主义研究应该把那些看起来“出格”的表达现象纳入理论框架，把这些现象理解为特殊情境下的抗争策略。

本文通过案例揭示，“污名认领”虽具有对抗性价值，也存在多重现实矛盾。比如说在表达效果层面，它既能讽刺性揭露社会道德标准的双重性，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引发更严重的排斥效应，比如被贴上心理疾病标签，或者导致自我价值感的持续降低。这种说法的两面性要求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也就是说不能简单把它说成是自由选择，也不能随便归为病态反应。社会学女性主义需要做到的是，在承认个体选择空间的同时，必须指出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成因，这样才能推动公众从简单的道德评判转向对制度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 [1]Ahmed, S. (2017). *Living a Feminist Life*.
- [2]Hughes, A., & Witz, A. (1997). Feminism and the Matter of Bodies: From de Beauvoir to Butler. *Body & Society*, 3(1), 47 – 60.
- [3]Bartky, S. L. (1990). *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oppr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 [4]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5]McRobbie, A. (2009).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SAGE.
- [6]Witz, A. (2000). Whose Body Matters? Feminist Sociology and the Corporeal Turn. *Body & Society*, 6(2), 1 – 24.
- [7]Gill, R.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 [8]de Beauvoir, S. (2011). *The second sex* (C. Borde & S. Malovany-Chevallier,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9).
- [9]Gill, R. (2007). Postfeminist media culture: Elements of a se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2), 147 – 166.
- [10]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11]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 [12]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3]Jeffreys, S. (2009). *The Industrial Vag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 Sex Trade*. Routledge.
- [14]Outshoorn, J. (2015). *European Women’s Movements and Body 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 [15]Weitzer, R. (2018). Resistance to Sex Work Stigma. *Sexualities*, 21(5–6), 717–729.
- [16]Berlant, L.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7]Berlant, L. (2008). The female complaint: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entimenta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8]Armour, E. T., & St. Ville, S. M. (Eds.). (2006). *Bodily Citations: Religion and Judith Butl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Edwards, K. J. (1999). *Body Politics: The ‘Body Problem’ in Feminist Theory*. UNSW Theses.
- [20]Tyler, I. (2020). *Stigma: The Machinery of Inequality*. Zed Books.